

西方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流派及观点综述

曹向昀

自19世纪80年代雷文斯坦(Ravenstein, 1885, 1889)以英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为背景,首先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的7条法则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将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联系,并把其作为有规律的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不过早期有关人口迁移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解释迁移运动的普遍的、抽象的条件上。例如:本世纪40年代,斯托夫(Stouffer, 1940)把迁移与距离及机会联系在一起,而基福(Zipf, 1946)则提出迁移与距离关系的法则。到60年代,李(Lee, 1966)把迁移研究推向更加复杂及抽象的阶段。他认为“迁移行为”是个体从原地走向目的地的行为,因此在研究“迁移行为”时,需要考虑两个地区各自存在的正面及负面因素、从迁出地到迁入地之间的障碍以及单个移民的性格特征。尽管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组合的变化很大,但李认为在这些因素之间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他提出与迁移规模有关的3个系列的假设关系:迁移与流量、迁移与流向以及迁移与移民的特征。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有关迁移的一些实证性特征的总体图像。

随着迁移研究实践知识的积累,60年代后期,迁移研究的方向有几个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研究倾向于从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方面考察迁移与主要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对“迁移”概念的定义依存于研究者所追崇的社会理论体系。正如勃格(Bogue, 1959)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再缺乏对迁移现象的解释,但却同时出现

了几种独立的不同的解释迁移的理论。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之下,学者们从宏观及微观角度对迁移的原因、决定因素(包括刺激迁移的因素,实际迁移的原因)、迁移决策过程、迁移的后果及移民特征等方面作过大量解释。

本文将介绍目前迁移研究领域中的主要流派,并对不同流派的观点及研究方法的相同、相异之处进行比较。所选的流派都是在60、70年代这一期间引导迁移研究方向并至今仍深有影响、具有代表性的概念体系。

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按照托达罗(Todaro, 1980)的观点,有关迁移的经济理论是从刘易斯(Lewis)的发展模式,后经费(J.Fei)和拉尼斯(G.Ranis)对此模式完善、演化而来的。这一模式将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即:生产率非常低乃至为零值、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村生存部门和生产力高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生存部门的劳动力逐渐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因此,人口迁移被理解为社会结构转变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现代部门的扩张造成了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的迁移,以及城市就业的增长。

但是,这个模式暗含的假设以及模式运行的预期结果,是随迁移发生的实际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导致了对迁移概念的重新界定。这里,迁移被认为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最少的成本的合理的决策过程。但是,无论是收益、成本,还是迁移优劣势的衡量过程都与心理因素有关。因此,托达罗

指出：很明显，最后的决策将受到移民对风险及对未知的态度的影响。在这个迁移概念中“个人”被假设与其他个体无区别（同性、同族及同为消费者），社会就是这些基本无区别的个体的聚合。这些个体在市场上交换着不同的物品以达到效用的最大化。经济学派最主要的假设之一就是个体呈现出来的合理性不仅对某个个人有利，也对整个社会有利。

托达罗将他在发展中国家中进行的迁移研究与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及地区不平等的经济发展相联系。他进而认为，迁移研究不仅应引入经济变量，如收入、投资及存款，而且应引入有关的非经济变量，包括土地使用的性质、社会等级和分层的影响以及信用结构等等。不过，他的研究仍限制在经济范畴内。

这一学派对社会现象的关注，用哥兹柴德（Goldscheider, 1971）的话说，是强调人口增长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具体来讲，就是对人类社会人口“爆炸”后果的关注。托达罗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最快，农村—城市的人口迁移是城市存在剩余劳动力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使本来已经很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继续恶化。与当今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速度比工业化的速度要高许多，这造成了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剩余。

早在60年代末，托达罗就观察到，不论是在土地剩余、劳动力剩余，还是资本剩余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存在失业和就业不充分这一慢性病的同时，农村往城市迁移的移民数量仍在不断增长。但是城市却没有能力为其中大部分移民提供长期稳定的就业机会。他从两方面着手解释这一现象。首先，他认为以前的经济理论将农村劳动力向生产力较高的工业部门的转移视为一步到位过程的观点是不实际的，没有考虑到在转移过程发生时，那些没有技术的农村移民是否有可

能真正在高报酬的城市工业部门中得到就业机会。他指出，在欠发达国家中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应被视为两步到位过程，即无技术的来自农村的移民首先在所谓的“城市传统部门”就业一段时间之后，再得到更加长期稳定的城市现代部门的工作；其次，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及城市吸纳就业的可能性会影响到潜在的移民决定是否向城市地区迁移。他提出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行为模式及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机能的分析模式，描绘和分析了在欠发达国家中各经济变量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将工业扩张、生产力增长、城市预期的真实收入差异同劳动力迁移增长的规模及速度乃至城市劳动力职业分布相联系。托达罗认为这一模式中最为重要的政策含义是：未经集中努力提高农村生活质量而大规模缩小城市传统部门的努力会相当艰难。他引用马歇尔（Marshall）著名的“剪刀类比”的描绘：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功能上讲既是城市“需求拉力”之一，也是农村“供给推力”之一。“所以，只要城市—农村实际收入的差距足够快地持续增长而抵销掉稳定产生的就业机会，那么，尽管长期存在着在现代部门当中谋求就业的较低可能性，这些部门当中相对高水平 and 稳定收入的吸引仍会继续造成农村移民涌入更加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因此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对减少农村—城市迁移及减少城市失业现象具有重要意义。这个理论框架在产生后数十年中，经常被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派当中有影响的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T. Schultz, 1945）及斯查斯特德（Sjaastad, 1962）认为，个体期望迁移会为其带来更大好处，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迁移。迁移本身是一种投资，迁移的收益在一段时间后可以得到。由于此种投资是以人为表征的，因此称为“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可以提高人类资源的生产力。这一理论被称作人力资本

模式。达凡佐 (DaVanzo, 1981) 认为, 这种理论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对于迁移以后一段时间发生的迁移收益的明确意识, 而正是这一点帮助解释了为什么随年龄增长迁移率下降, 因为迁移回报期与年龄成反比。另外, 把迁移看作一种投资可以解释移民在并未期望收入会随迁移而立即提高时 (如从事旨在未来受益而现在需要花费的活动) 迁移行为发生的合理性, 认为只要个体从长远角度预期到收益时就可能发生迁移。达凡佐在人力资本模式当中加入了更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变量。她在分析随迁移发生的成本及收益时, 认为迁移成本不仅包括与迁移有关的直接费用 (直接成本), 也包括移动和寻找新工作花费时间的成本 (机会成本), 还有特定地点资产的放弃 (包括客户, 离别朋友及亲属、熟悉的环境所付出的心理成本)。与此相似, 迁移的收益也不仅包括收入的提高、额外福利的增长, 而且包括非工资的收入 (更高的福利及农业补贴) 及更好的环境 (更加令人愉快的气候、更好的文化设施、更加便利的健康诊所、更好的学校或培训机会, 与朋友、亲属更亲密的接近等等)。她用两地间迁移净收益价值说明这一模式。在分析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时, 这一模式尤为适用。

人类生态理论 (Human Ecology)

与经济理论不同, 生态学派“关心的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与形式”。“人类生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 当人口组织发展时, 人口在某一环境中生存机会的增加。”在这个理论中, 迁移被看作人口对其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变化的一种反应。具体来说, 迁移是一种机制, 能够使人口规模和生存机会之间达到平衡。用赫雷 (Hawley, 1950) 的话说, 迁移是非周期性的一种运动形式, 是从一种组织形式向另一形式转变。同时, 迁移是变化发生的方式 (重新适应过程), 并且是量度变化的手段。

赫雷认为人口组织有5个基本原则: (1)

组织当中相似或相异的单元是互为依存的, 类似自然界中的共生、共食; (2) 组织是连结社会体系及其环境之间的基本纽带; (3) 组织是根据生产力状况来分化其各部分功能的; (4) 在组织中, 行使主要功能的单元占统治地位; (5) 由单元组成的相似的组织构成一个体系。

所有的社区及社会体系都有动态的特性, 这是由于其中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系统成熟”和“演化进程”, 这些持续的运动使社区及社会体系趋于再平衡。其中后一种运动是以扩展过程为主要形式的, 因此产生一种不断增进城市化的趋向。赫雷将其定义为“增进组织疆域范围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带来更高一级的复杂性及更大的变化范围, 因此包括了一种完全的社会转变过程。社会的各种单元不断地整合于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之下。

在这种变化中, 人口通过迁移流向生存机会最大的地方。赫雷还观察到大规模的迁移总是以资本移动为先导的。迁移流是从资本投资率低的地区向资本投资率高的地区流动。费利斯比和波兹顿 (Frisbie and Poston, 1975, 1976, 1978) 对此也作过阐述, 认为在前类地区中“推力”因素起作用, 而“拉力”因素在后类地区中吸引着迁移的发生。

邓肯 (Duncan) 对赫雷的理论作了最有成效的补充及完善。邓肯第一次提出了“生态复合” (Ecological Complex) 这一概念。^① 他认为赫雷过分强调组织, 而组织只是生态范畴下的一个问题。他认为生态复合的4个主要的方面 (人口、组织、环境及技术) 当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作为因变量来分析。

赫雷的理论为其后生态理论的发展奠定

① 参见 Sly, David F., Migr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complex,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October, 1972.

了基础。以他的理论为基础,人类生态学派分化出两大分支:生态复合模式(ecological complex model)以及生存组织模式(sustenance organization model)。从概念上来说,两个分支的不同之处是,前者关心的是生态复合系统中4个因素——人口、组织、环境以及技术——在相互依赖的体系中的关系,而后者则强调组织的构成,特别是生存—生产性活动。实际上这两个分支并无明显差别。因为总的来说生态复合模式很少能够全方位地检验生态体系框架,所以研究迁移现象时,两个模式的生态学者研究的是相类似的问题。他们都关心都市及非都市地区生态复合体系中的一个或更多个组成方面与迁移的关系。不过,生存组织一直是生态学派研究的重点。例如,费利士比和波兹顿(1975, 1976, 1978)在生存组织与人口迁移有关的总前提之下,分析了这种组织的具体形式是如何影响迁移,以及这种组织的精巧复杂是如何重要。同时,也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生态模式与生存组织有关。斯莱(Sly, 1972)曾在分析中指出,美国南方各县男性黑人迁移是对人口组织变化的一种反应,而人口组织的变化却受到环境与技术条件的影响。斯莱在1977年对美国标准都市统计区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心城市的迁移状况进行分析后,修改了其生态复合模式,认为在这些地区的迁移是环境变化的反应,而组织与技术通过作用于环境进而作用于人口迁移。

生态理论研究的主体是社会整体,这一研究不能扩展到社区当中的个体。因为“社区整体不同于其中个体的相加,个体并不产生支配的力量和潜能”(Hauwley, 1950)。尽管如此,不少生态学家也从微观角度来研究迁移,如斯莱就曾对肯尼亚农村13~21岁的青少年作过追踪调查,以研究迁移的决策过程及迁移行为。

现代化体系(Modernization Theory)

现代化理论者认为,人口发展进程是与

社会变化紧密相关的,研究人口迁移应该考虑迁移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哥兹柴德(Goldscheider, 1971)认为,“在迁移概念中包括了所有居处的变更——由原址迁到另一处,但不包括未脱离原有活动组织的移动或整体循环移动(如旅游、旅行及通勤)”。现代化进程在这里有双层含义:(1)社会结构的发展是以分化、多样、裂变为特征的。这是一个社会体系总体的转变以及重新整合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之下的过程。(2)制度结构的发展,以适应不断的变化及持续的现代化。制度结构的变化包括了一整套被规范化了的价值观、态度、愿望及目标(包括个人目标及社会目标)的变化,以及促成变化发生或由社会结构变化而带来的一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变化。

作为现代化进程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与迁移是互为因果的。在某些条件下,如工业化之初,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或国际流动开始时,人口移动会刺激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如在工业化成熟与发达阶段,都市之间的迁移就成为对经济增长及劳动力需求的反应。所以,迁移可以被视为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个重新整合部分和一个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迁移和人口再分布是工业社会演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微观角度分析,现代化理论者把迁移作为个体整合于社会的结果。他们假设个体心理变化是行为变化发生的必要条件。行为变化的发生分三个层次:心理选择迁移、移动、整合(Germani, 1973)。迁移首先是心理移动,随后是物理移动。按照这个发展过程,从落后、传统的农村地区向先进及现代化的城市地区的迁移已属物理移动阶段,是个体整合于城市环境过程中的个体行为。对于移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调整”,现代化理论者作了大量论述。他们假设移民未受过教育,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对移民适应调

整的考察，主要针对移民找到一份固定工作所耗精力及时间，随后职业、所能支付的居处类型以及社会心理状态（如参与组织的水平、犯罪率、情感问题、态度等等）（Urzua, 1979; Price and Sikes, 1975）。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从个体层次上研究迁移的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被认为等同于动机（Munoz and Oliveira, 1972）。迫使个体移动及选择具体目的地的动机类型（有关工作、教育或家庭）与个体之特征有关（如年龄、性别、志愿、教育及在原地的职业），这些特征被用作分析迁出地社会背景的指标。（Elizaga, 1972）。

在做个体分析时，现代化学者不仅分析个人特性和社会特征，也强调个体的生命周期的影响。哥兹柴德认为生命周期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有三点：（1）性情与年龄变化有关；（2）在家庭—亲属结构中各角色的构造与性情、年龄有关；（3）职业及经济系统中角色的构成也同性情、年龄有关（Goldscheider, 1971）。

关于与迁移有关的条件，德曼尼作了最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推—拉因素产生于迁出地及迁入地区现代化程度上的相对差异。分析当中必须考虑两组变量：其一，作为干扰变量的社会准则及价值观；其二，社会心理水准与特定个体的态度和期望。只有在一个完全整合的社会，社会规范才能准确反映其成员的态度。

在阐述现代化研究当中的两个主题时，哥兹柴德首先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和相关性。观察到的现代国家的相似之处明显或不明显地表明了非现代化地区将会经历的演化趋势。一个现代工业体系所需要的组织及制度，制约了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同时他也强调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由于前现代化时期的差异、不同变化速度、变化途径，以及变化时间及原动因的不同，这些前提限制了除精确的社会组织形式之外的变化的总体进

程。由此决定了迁移在不同社会当中的发展趋势。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扎林斯基（Zlinsky）在1971年提出的移动转变假说。扎林斯基认为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相关，也与人口转变相关。他将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的5个阶段与人口移动转变的5个阶段相对应，系统地阐述了迁移在各阶段的变化类型。这一假说在现今迁移研究论著中被普遍引用。

马克思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Marxist or Neo-Marxist Theory）

对于这个体系的研究者来说，迁移是劳动力的运动，是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迁移不外乎是人口分布的一种机制，通过迁移使劳动力最终适应经济活动的空间安排。辛格（Singer, 1972）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只有通过制度安排才成为可能。它一方面可以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把积累的剩余资金引导到采用新工业生产技术的企业中去”。由于市场机制对资源定位及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失灵，这种干预机制随技术进步及资本集中趋于加强。另外，迁移及其他形式的人口变化（死亡率、出生率的变化）被看作是等级结构与生产方式重要变化的表现。

资本扩张的两个特征直接影响到对迁移的研究。首先，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运作的经济、政治体系，其组成部分的分化组合形成核心、周边及半周边国家（Hopkins, Wallerstein et al, 1982）；其次，就具体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而言，资本主义扩张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不均衡，而且在各国内部也不均衡。资本固有的不断集中的特性造成经济活动的集中，其结果是人口的集中。

这个学派认为所有的运动均是由于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矛盾关系造成的，强调生

产结构和社会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物质方面。因此，从生产结构变化（生产形式以及生产者与生产手段间关系）角度而言，迁移是历史变化的基本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一种表征。由于上述原因，他们强调劳动力动态变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从历史变化的角度研究资本扩张及人口迁移。在过去的世纪中，国家间劳动力迁移已从由核心至周边国家的迁移转变为由周边向核心国家的迁移。他们认为这种变化是世界范围资本集中的结果，这期间不仅包括经济进程，也包括了社会政治进程。波兹（Portes）在1981年指出：国际迁移并不由于各个自治国家间的经济比较优势而发生，而是核心国家需要将经济及政治制度向周边地区渗透的结果，而且这种渗透需要周边国家统治阶层的某种默许。

与这种集中和迁移现象有关的社会经济进程，是那些与劳动力以资本为目的生产及再生产有关的进程。辛格认为资本通过两种机制产生其所需的劳动力：一是以最终解放人口，使其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力来破坏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是来自“简单商品生产方式”的剩余人口，这或是由于资本主义对其发展的阻碍（以土地而言）或是由于生产力不断提高（部分因为采用先进技术）造成。按这种解释，劳动力不断趋向无产阶级化就成为与迁移有关的主要而具体的历史变化。

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大量精力放在研究具体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整合于社会政治变化当中的。这就需要从长期的角度考虑在某些具体群体统治之下的发展及其整合于国际经济当中的结果。不同社会群体的内部安排形成地区发展的具体模式，也促成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在这个市场中，各具体部门的劳动力以不同的方式得以整合。或是由于“变化的因素”（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入农村）或是由于“停滞的因素”（如农民无

力进一步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农村人口日益依赖于这种市场，主要地但不唯一地依赖于城市（Singer，1972）。

在这个体系当中，针对迁移的研究分出了两个支流：历史派及结构派。总的来说，前者注重研究资本扩张进程中几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及人口）的相互联系；而后者则更多地限制在经济范畴内，特别注重从等级结构的角度研究。这两种支派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区别。前者主要依据二手材料，而后者则把二手材料与调查以及访谈结合起来。

这一学派同以前提到的几个学派一样，试图揭示人口地理运动是如何通过经济资源不平等、不均衡的分布而形成的。但是，维纳加斯认为（Venegas，1983），这一学派与其他学派还是有几个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大量研究是解释劳动力的国际间流动，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当周边国家劳动力向核心国家的迁移成为主要趋势之时（Marshall，1974；E. Mclean，Petras，1981，1984）。对于跨国运动的研究也包括比较在世界经济当中处于相近似地位的国家的情况（Marshall，1981，1984）。第二，他们试图将不平等的发展解释为特别社会群体（决定具体集中模式）在经济及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性结果（Geisse，1983；J. R. Rando Lopez，1974；Balan，1974）。第三，地区间不平等性是从不同的生产关系角度而言的（Pare，1979）。第四，强调地区间不平等性，把他们的研究从城市为导向转变为以农村为导向。第五，其结果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包括各种形式的迁移，而不仅仅是农村向城市的迁移（CSUCA，1978）。同样，他们把原有的地区性结构差异与迁移体系的构造相联系。这里所说的迁移体系将生产结构与补充性（有时是矛盾的）需求相联结（Mato Mar，1981；Miro Rodriguez，1981）。这一学派对于未预期到的非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持续,以及短期的农村向农村的迁移日加重视(Balan, 1982; de Souza—Martins, 1984)。

比较和小结

从前面所介绍的几种有关人口迁移的主要学派的观点中不难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首先,各学派都把工业化进程同迁移现象相联系,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其次,都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分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分布造成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第三,在资本(或现代生产方式)集中的城市或其它地区人口也集中,因此出现人口净迁入;第四,他们一致认为对地区间差异的比较(推—拉因素)对形成迁移是非常重要的。推—拉因素特别为人类生态学家及现代化学派所强调。不过现代化理论者也赞同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即认为单纯这种比较是不足以充分揭示迁移现象的。

几个学派的不同之处也显而易见。主要体现在对迁移的定义、对迁移现象的解释以及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差别。

对迁移的定义存在差别,主要是因为各派的研究背景、假设和理论框架不同。经济学派认为迁移是理性的、经济的个体决策过程;人类生态学派则表示迁移是人口规模与生存机会间的平衡机制;现代化理论认为迁移是个体整合于现代社会的进程;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强调人口迁移是劳动力再生产和屈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

在解释迁移原因时,各学派的主要不同之处有如下三点:

1. 对迁移与社会经济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认识。现代化理论清晰地指出人口迁移(及总的人口现象)与社会经济变化互为因果。而其他学派明确(Todaro, 1981; Portes, 1981)或不明确地(Hawley, 1950, Singer, 1972)接受迁移是社会经济变化结果的假设。

2. 历史条件在各学派中所占的位置。研究迁移的各派学者普遍认为工业化历史进程与人口迁移有关。但是,历史因素在各个研究框架中所占权重及涵义并不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长期变化进程是解释迁移现象必不可少的因素。因为,迁移本身就是进程的一部分,依据这个进程,资本家采取不同的手段以确保他们所需的劳动力。现代化理论之中的历史性体现于他们提出现代化进程阶段的观点。对所研究的内容,他们分为“传统”、“转变”或“现代”各个不同阶段,只不过在总括的范围内,研究常集中在剖面上。与此相类似,人类生态学家的“独立”和“依赖”社区与现代化学派“传统”和“现代”的区分很相似。不管如何称谓,从这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意味着一种运动,人口变化必须与之相适应。但是,生态学家声称历史变化必须放在“生态含义”之下分析,这是现代化学派与人类生态学派的显著区别。赫雷指出,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被看作是阶梯式的社会体系类型作时间顺序的描述。对阶梯之间发生的事情,或从一个阶梯到另一阶梯运动如何发生,现代化理论都未讲清楚。而生态扩张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阶梯间的转变。最后,经济学派由于其不重视历史变化进程的原因而受到批评。

3. 解释中所涵盖的社会范畴。各个理论框架在他们对迁移的解释当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包括经济结构(职业等级、生产组织、技术)。不过,对于人类生态学家,经济结构是不可缺的主要方面,是“生存关系的形式或模式,是这种模式发展的进程,以及影响它们发展的要素”(Hawley, 1950)。心理因素是现代化理论和经济理论所强调的,不过,他们是以不同方式强调的。前者注重作为个人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的个体态度和价值观,后者则认为个体的特有的理性是行为的直接原因。另外,现代化理论还考虑社会

规范的影响。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考虑政治范畴。他们认为不考虑权力关系是不可能理解结构的变化。

这里应该强调一点, 尽管四个理论体系都包括经济结构, 但实际上对于各体系的学者来说其概念是不一样的。例如: 所有体系都将人口从经济角度分层, 不过, 经济学家把收入或工资水平作为划分的主要标准, 而其它体系则运用职业状况作为分层的基础。因为职业状况对于人类生态学家来说意味着生存活动的类型, 对现代化理论学者意味着传统职业与现代职业的划分, 而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体现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尽管有时这种不同并不重要, 但是, 从解释角度看, 的确有差别。

最后, 各学派的分析主体单位不同。由于理论框架不同, 经济学家与人类生态学家分析的主体单位恰恰相反。经济学家把个体作为分析的单位, 而人类生态学家的研究主体则是社区或说是社会体系。现代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研究迁移时都不止有一个分析单位。现代化理论是从各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如传统与现代)出发来分析迁出地与迁入地区对形成迁移的影响, 以及研究个体特征在决策迁移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则通过资本主义扩张(或者说整合于资本主义产品和劳务市场)中的等级分化, 来解释结构水平以及这种结构水平是如何构造具体等级设置的。

参考文献

- Bogue, Donald,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An Inventory and Appraisal, Hauser and Duncan (ed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9.
- DaVanzo, Julie, Microeconomic approaches to studying migration decisions, in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Pargamen Press, 1981.
- Frisbie, W.P. and D.L. Poston, Jr.,

Components of sustennace organization and non-metropolitan population change: a human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December), 1975.

—, The structure of sustenance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change in nonmetropolitan America, in Rural Sociology, 41 (fall), 1976.

—, Sustenance Org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 Nonmetropolitan America, Iowa Urban Community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Iowa City, IA., 1978.

Germani, Gino, Urbanization, social change,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 Crisi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U.S.A., 1971.

Goldscheider, Calvin, Population,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71.

Hawley, Amos,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1950.

Hopkins, Wallarstein et al.,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Sage Publications, Beverlyhills, CA., 1982.

Lee, Everett S, A theory of migration, in Demography, No.1, 1966.

Marshall, Adriana, The role of labour migrations in the labour market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immigration countries. CICRED, Internaitonal Migration, 1974.

Portes, Alejandro, Toward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illegal (undocumented) migration, in Global Trends in Migr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of

-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M. Kritz et al. 1978.
- , Labour Cla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81.
- Poston, D. et al., Sociological human ecology: theoretic and conceptual perspectives, in Sociological Human Ecology: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Applications, M. Micklin and H. Choldi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and London, 1984.
- Poston, D. and White R., Indigenous labour supply, sustenance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in nonmetropolitan America, an extension of the ecological theory of migration, in Demography, 1978.
- Price, D. and M. Sikes, Rural-urban Migrati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75.
- Ravenstein, E.G., The laws of migration,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London, 1885, 1889.
- Schultz, T.W., Agriculture in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York, 1945.
- Sjaastad, Larry A., The cost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 Sly, D.F., Migr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complex,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2.
- Sly, David and Tayman, Jeff, Ecological approach to migration reexamined,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7.
- Stouffer, 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 a theory relating mobility and distance,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1, 1940.
- Todaro, Michael,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1980.
-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ongman, Inc., New York, 1981.
- Venegas, Sylvia, Conventional theories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y of migration: An apprais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U.S.A. Literature, 1983.
- Zelinsky, Wilbur, 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i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No.6, 1971.
- Zipf, G.K., The PP/D hypothesis, on the intercity movement of persons,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6.
- (本文责任编辑: 徐 莉)
- (作者工作单位: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